

偵探小說？女性自傳？——

論羅莎·孟德羅的《吃人肉者的女兒》 (*La hija del canibal*, 1997) 之女性自我實現

楊瓊瑩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

自從佛朗哥獨裁時代結束後，第二波女性主義帶動了兩性平權等議題，西班牙文壇頓時興起女性作家的創作熱潮。孟德羅 (Montero, 1951~) 是崛起於七〇年代末期的西班牙中生代女作家，也是當今該國文壇深受文評家與讀者喜愛的暢銷作家。她的小說具有經典作品的品味，經常借用當代市民的聲音探討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吃人肉者的女兒》(*La hija del canibal*, 1997) 是孟德羅的第七本小說，這一部小說承襲孟德羅先前作品裡的女性主義議題，融入了不同的大眾文化之元素。小說以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書寫，故事一切源於丈夫的離奇失蹤、被綁架，而孟德羅則藉著偵探小說及女性自傳文體的結構模式試圖展現女主角兼敘述者追尋自我實現的心路歷程。

本論文旨在分析該書中的偵探類體裁與女性自傳文體，如何當作女主角追求自我實現的文本，又如何突破且重新闡述傳統性別之界限，進而再現女性的特質及建構女性主體的論述。

關鍵詞：偵探小說、女性自傳、女性自我實現、羅莎·孟德羅、《吃人肉者的女兒》

一、前言

自從佛朗哥獨裁時代結束後，第二波女性主義¹帶動了兩性平權之議題，性別政治不管在普羅大眾文化或學術上均造成極大的迴響。西班牙文壇頓時興起女性作家的創作熱潮，而社會大眾也爭相閱讀女性作家的作品，造就了不少女性暢銷作家。孟德羅（R. Montero, 1951~）是崛起於七〇年代末期的西班牙中生代女作家，也是當今該國文壇深受文評家與讀者喜愛的暢銷作家。她早年從事新聞採訪的工作，曾替西班牙第一大報《國家報》（*El País*）撰寫人物訪談而大受歡迎，也曾獲該國新聞界首獎，目前則致力於寫作，但持續在《國家報》（*El País*）開闢專欄。孟德羅的小說具有經典作品的品味，經常借用當代市民的聲音探討社會與文化的變遷。自從1979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失去的愛》（*Crónica del desamor*）以來，孟德羅大部分的作品皆清楚地傳達女性主義的論述，字裡行間不時展現作者對於當今女性境遇的關懷，尤其是弱勢、邊緣女子面臨父權社會所遭受的性別歧視、性暴力等議題，都是作者批判的主題。

《吃人肉者的女兒》（*La hija del canibal*, 1997）是孟德羅的第七本小說，此作品是一部承襲孟德羅先前作品裡的女性主義議題之寫實小說，並且也融入了不同的大眾文化之元素。首先，孟德羅與許多當代其他的作家一樣，運用偵探小說（嚴格說來，應該是美式硬漢偵探

致謝辭：本論文乃筆者95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NSC95-2411-H-004-051-）之部分成果。筆者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對修訂文稿所提供的寶貴建議。

1 1960年代以後的女性主義被稱為第二波。在一些歐美國家，女性在法律上幾乎已獲得平等的地位，第二波女性主義則專注於女性在社會和經濟上獲得全面性的平等。

小說)的文體結構來敘述一個動人的故事，同時也呈現作者對於現今西班牙社會的批判。小說以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書寫，故事一切源於丈夫的離奇失蹤、被綁架，而孟德羅則藉著偵探小說及女性自傳文體的結構模式，來試圖呈現女主角兼敘述者追尋自我實現的心路歷程。

本論文旨在分析該書中的偵探類體裁與女性自傳文體如何當作女主角追求自我實現的文本，又如何突破且重新闡述傳統性別之界限，進而再現女性的特質及建構女性主體的論述。

二、偵探小說體裁與《吃人肉者的女兒》

偵探小說一直是備受爭議的文學作品型類 (genre)，它雖擁有廣泛的讀者群，時而在文類創作與出版市場創造佳績，卻不為文學批評家所重視，而常被冠予「庸俗文學」(low literature)、「通俗／大眾文學」(popular literature) 等稱號。然而不容否認地，七〇年代於西班牙蓬勃興起的偵探小說，在該國文壇卻造成極大的迴響，尤其對於破除「通俗／大眾文學」與「學院派文學」之界線，極具正面的意義。偵探小說不僅是普羅大眾閒暇之餘的讀物，也是西班牙許多知名作家諸如馬奴爾·巴士克·莫達爾曼 (M. V. Montalbán)、艾杜瓦多·門多沙 (E. Mendoza)、璜·馬德里 (J. Madrid) 以及安德烈耶·馬爾丁 (A. Martín) 等人藉以批判社會的工具，他們的作品融合了大眾文學與個人獨特的創作風格。文評家認為，偵探小說體裁已成為七〇年代末期西國轉型期 (transición) 文學探討社會現實的最佳方式 (Sanz Villanueva, 1985: 8)。此外，隨著後現代文化的興起，許多文學創作者巧妙地運用通俗文學類體裁於作品中，就連一向不被重視的偵探小說，也成功地脫離非主流的趨勢。

一般而言，偵探小說可分為兩大派別：傳統英式推理小說（British/classical detective novel）及美國硬漢偵探小說（American tough/hard boiled school）。²以愛倫坡（E. Allan Poe）及柯南·道爾（C. Doyle）為代表的英式推理小說，強調嚴密的邏輯分析，刻意營造懸疑氣氛，作家筆下的偵探則具有超人的推理能力（神探福爾摩斯），是維護社會正義的使者。美國硬漢偵探小說（西班牙文譯為 *novela negra americana*）崛起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它在形式及意識形態上皆有別於傳統英式推理小說。在形式上，美國硬漢偵探小說家諸如達錫爾·漢梅特（D. Hammett）、瑞蒙·錢德勒（R. Chandler）不再玩弄推理遊戲，誰是兇手已不是重點，能夠運用寫實手法刻劃社會百態，反映社會陋習才是他們的主要訴求。因此，社會批判（social criticism）成為該類小說的重要特色。此外，美式私家偵探不再是社會正義、公理的代言人，轉而是既剛強、又憤世嫉俗，但卻往往必須為生計奔波的凡人。文評學者瓦耶·卡拉德拉瓦（Valles Calatrava, 1991: 108-110）則認為，七〇年代末期興起的西班牙偵探小說，較接近美國硬漢偵探小說的模式。如同美國二〇年代大蕭條時期有助於批判文學的發展一樣，七〇年代隨著佛朗哥的過世，西班牙適逢進入轉型期，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城市犯罪率大幅提高，其中尤以暴力、娼妓、警政貪污等問題最為嚴重，而這些問題也成為日後西國偵探小說作者所關注且批判的主題。此時，西國出版界又大量翻譯美國經典偵探小說，再加上知識份子的重視與投入，均促使西班牙文壇產生一群以美國硬漢偵探小說為創作模式的作家。

然而長久以來，由於西班牙文學評論家的性別偏見及男性優越

2 關於美國硬漢偵探小說的文體分析，詳見 George Grella（1976: 37-57）及 Javier Coma（1980: 11-17）。

感，致使女性作家的作品通常不被選錄於西班牙文學歷史，其作品可說是「被邊緣化、被平凡化、或是被忽視了」（Davies, 1998: 3）。就偵探小說文體而言，西班牙女性作家更是極少被提及，即使她們早在該文體發展之初便投入創作。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巴尚（Emilia Pardo Bazán），早在 1911 年她便出版了中篇偵探小說《血滴》（*La gota de sangre*），對於西班牙早期偵探小說的發展扮演著先驅者的角色。另外，五〇年代頗受大眾歡迎的暢銷女作家卡爾（I. Calvo de Aguilar），經常運用英式古典偵探小說的模式於作品中，可說是西班牙的克麗絲汀（A. Christie），然而她的小說也從未出現在偵探文學評論中。嚴格說來，西班牙女性偵探小說的蓬勃興起必須等到八〇年代之後，足足比其他西班牙男性偵探小說晚了許多年。因為許多男性偵探小說家，例如：拉古魯斯（Lacruz）、賈西亞·巴封（García Pavón）等人早在五〇年代便相繼出書而受到大眾的青睞。美國知名女性主義學者克萊（Klein）批評「長期以來，偵探小說文類的創作一直存在性別偏見，以至於傳統上女性邊緣地位的迷思，無法讓女作家從此文類中突顯出來」（Klein, 1995: 2），因此，她認為必須創作以女性為中心（feminocentric text）之偵探文本，以拓展偵探小說更廣闊的視野。對於女性作家與女性讀者而言，偵探小說，尤其是美式硬漢偵探小說，經常反映當代社會與文化的種種變遷，比起其他文學形式或許更貼切地呈現與女性相關的嚴肅議題，例如：性別壓迫、性暴力、自我追尋與實踐等。偵探小說提供了理想的文學模式與寬廣的書寫空間，讓女性作家盡情的抒發其女性主義之論述，進而藉著女性主角偵辦犯罪案件，探討女性權力與女性意識的覺醒。當然，這與女性在傳統男性偵探小說中所扮演的惡女角色形成強烈的對比。

《吃人肉者的女兒》描寫露西亞（Lucía）追求自我實踐的成長故

事。她與拉蒙（Ramón）是一對失去真愛卻仍勉強在一起的夫妻。他們兩人原先決定赴維也納共度新年，然而在馬德里巴拉哈斯（Barajas）機場，就在飛機起飛前幾分鐘，拉蒙突然離奇的失蹤了。露西亞由於無法忍受警方緩慢的辦案速度，她自己便開始充當偵探，尋覓丈夫失蹤的真相。為了執行調查的工作，露西亞仰賴兩位頗為特別的鄰居之協助——菲利克斯（Félix），一位 80 歲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是昔日曾風光一時的鬥牛士兼殺手；阿德利安（Adrián），則是年約 20 多歲目前失業的音樂愛好者。緊接著發生一連串有關於拉蒙被綁架的奇異事件，而女主角經過數次的嘗試，終於成功地交付贖金。儘管如此，拉蒙並未返家。根據警方的調查，拉蒙捲入了自己的綁架案。事實上，這是一樁牽扯到政府高階官員的貪污弊案。原先被認為是受害者的拉蒙，也搖身一變成為自己案件的涉案者。

很明顯地，就作品結構而言，《吃人肉者的女兒》應屬於美式硬漢偵探小說的類型。孟德羅巧妙的運用美式硬漢偵探小說的文本相互指涉（intertextuality）來探討女主角自我成長之歷程。我們不難想像作者想藉著偵探小說體裁，以呈現女主角兼敘述者經由偵查案件的過程，學習自主及建立自信，之後又如何掙脫父權社會體制對女性之性別偏見及壓迫，而終能尋覓屬於自我的空間。本作品除了具備偵探小說的主要元素，例如：犯罪案件之發生、調查案情，以及案件的偵破等等，同時也包括作者對於西國九〇年代的社會批判以及對於人生的詮釋。所有這些偵探小說之特點，也因作者的不同意圖而有所修正。乍看之下，小說源於一樁離奇的失蹤案件，故事籠罩在詭譎的氣氛裡。敘述者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不時玩弄文字遊戲，並且在某些場合打斷故事的進行，對於特殊事故的不實書寫提出說明。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第二章，敘述者透露她蓄意將拉蒙失蹤的日期改為 12

月 28 日（西班牙愚人節），因為她認為「倘若能將事發日期挪至愚人節，這個荒唐的故事會顯得更完美」（esta historia absurda quedaría redonda si fechaba su comienzo en el Día de los Inocentes）（17）。在此情況下，充分顯現敘述者獨特的幽默感，如同人們在愚人節所開的玩笑。事實上，真實與虛幻是永遠無法區別的，因為人生充滿了無限的神秘、巧合與不合邏輯。而偵探小說文體則更能呈現小說人物如何探索真相，發掘生命的矛盾與奧秘。

對於小說人物的塑造，孟德羅顛覆了美國硬漢偵探小說的人物雛形。有別於美式男性偵探的專業與冷酷，小說中的偵探角色由露西亞來擔任，她是一位年約 40 多歲的女性兒童文學作家，由於環境所迫而扮演此角色，以便偵查丈夫失蹤的真相，所以也談不上具備任何專業的辦案訓練與經驗。事實上，露西亞代表生長於佛朗哥獨裁政權下的平民女子，長期以來，生活在父權的陰影之下，而婦女權益不受重視；一直到佛朗哥逝世後，婦權開始受重視，因此，面臨民主世紀的來臨，露西亞必須勇敢的接受性別課題的挑戰，以追尋自我之實現。然而屢次的情感受挫、與家人關係破裂，致使其罪惡感、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而導致缺乏自信。露西亞這樣的特質，不僅不符合硬漢偵探的性格，也和時時充滿自信且掌控全局的女性主義偵探大相逕庭。拉蒙的失蹤，整體而言，可說是露西亞追尋自我實踐的動力，但是丈夫的離去，在小說的前幾頁，充分證明對於女主角仍是一項重大的打擊。敘事者在字裡行間流露出露西亞失去拉蒙的極度悲傷，不斷重複：「我沒有人可依靠了」（25），她甚至認同自己是屬於一群被遺棄的女子，一群總是無助地等待的絕望寡婦。露西亞在菲利克斯與阿德利安的鼎力相助下，從被動的參與偵察丈夫失蹤的真相，至主動推斷案情、策劃救援拉蒙，足以證明女主角行為模式的改變。在辦案的過

程裡，露西亞思索婚前的自己是積極主動、大膽、具有雄心大志，然而這股生命的動力卻在婚後逐漸消逝，婚後的自己遷就於平淡、近乎於悲慘、毫無感情的婚姻生活（116）。隨著案件的進展，露西亞對愛情與生命的熱情再次點燃希望之火，然而在拉蒙揭露涉案的真相後，這股動力化為烏有，所換來的是失望、省悟。女主角的一句「一切已結束了」（309），象徵揮別父權體制的桎梏。

由於《吃人肉者的女兒》是一本以女性議題、女性人物（露西亞）為中心的小說，男性人物多半扮演較為次要的角色。菲利克斯是位行事謹慎、喜好隱藏過去的長者。他在案件調查的過程裡，扮演露西亞的副手，尤其當她面臨綁架者的威脅時，更不時提供建議與策略。在某些情況下，菲利克斯儼然具備傳統英式神探與美式硬漢偵探的特點，更誇張的是，他為了保護露西亞免受綁架者的侵襲，不惜冒著性命危險舉槍射擊侵襲者，像極了黑色電影裡的硬漢英雄。然而以他 80 歲的高齡，菲利克斯實在不適合擔任偵探的工作，再則由一個從未接受專業訓練的普通人來接手偵查重任，這在偵探小說也很不尋常，因此，從菲利克斯的人物刻劃上可感受到反諷的意涵。波斯勒特（Postlewate, 2002: 137）在其論文也指出，允許菲利克斯負責調查案件，似乎強調傳統父權社會的虛偽，也就是倡導女性的謙卑、恭順（137），她認為作者應不是開女性主義的倒車，而是藉此對女性角色的界定作一番省思。女性因自身所處之社會處境而扮演不同的角色。相較菲利克斯的睿智、英勇，阿德利安則顯得衝動、暴躁，代表新世紀年輕一代的直率以及追求自由生活的意願。阿德利安在小說裡充當菲利克斯的助手，但他與露西亞的戀情，卻為她黯淡的生命開啟無限希望與自信。

社會批判則是《吃人肉者的女兒》依循美式硬漢偵探小說傳統的

重要元素。小說中，不時顯現九〇年代西班牙社會的腐敗亂象與犯罪徵兆之批判。事實上，拉蒙的綁架案只是一場騙局，一場精心策劃的演出，以便逃避司法單位偵查這樁牽扯到政府高階官員的貪污弊案。孟德羅的小說異於傳統英式推理小說，因為作品雖然闡明真相，然而犯罪案件並未獲得解決，也未懲罰涉案之歹徒。

在《吃人肉者的女兒》，有許多場景顯現犯罪儼然成為現代社會生態的一部分。女主角兼敘事者從故事一開始，便目擊且經歷一連串暴力事件的威脅，從綁架者的攻擊，小狗耳朵的撕裂，到警探屢次試圖綁架她本人，都使她怵目驚心，但也藉此一再反省她與拉蒙的夫妻關係，進而思索女性自主的議題。拉蒙的綁架案件，的確喚起露西亞必須面對自我困境之意識，她不斷自責，多年來她竟能允許丈夫愚弄、欺騙自己，這乃是女性長期依附父權，扮演被動、受宰制的角色所造成。整個偵查拉蒙失蹤事件的歷程，彷彿是女主角逐漸尋求自我成長及突破父系文化傳統束縛的艱辛旅程。我們發現，露西亞積極地試圖參與調查丈夫的失蹤真相，透過回想以及與自己內心的對話，女主角逐漸對自身的角色有較深刻的省悟，進而加強女性的自主意識。

三、女性自傳與女性自我的實踐

女性自傳文體³是《吃人肉者的女兒》的另一個結構脈絡，其論述也是該作品的精華。蘿拉·馬庫斯（L. Marcus）在她的研究裡強調自傳文體有助於探討女性主義的議題，特別是主體性的詮釋，以及個體、群體身分認同的界定（1994: 279）。琳達·安德森（L.

3 一般而言，「自傳體」有兩種：原著作者自傳，以及主角人物的仿自傳體。本書屬於第二種自傳文體。

Anderson) 也指出自傳體是女性主義者在特殊的時空裡撰寫主體論述極為優勢的策略(2001: 87)。透過女性自傳, 我們逐一研讀孟德羅如何耕耘女性主義的論述, 例如自由、自我發現與實踐等主題。《吃人肉者的女兒》以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書寫, 是一部根據露西亞個人片段生命經驗的女性自傳小說。當拉蒙的失蹤真相大白後, 露西亞開始另一階段新的人生追尋, 開始嘗試探索自己在不同的生命時期所經歷的人生經驗。我們可以說女主角兼敘述者運用女性自傳文體, 一方面尋找莎麗·孟德(S. Munt)⁴提及綁架案裡的「內部影響」之答案(此與心理分析、女性偵探小說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則尋找解決目前困境的方法, 使她得以創造新的身分而邁向自我實踐。

相較於傳統自傳小說多半著重在主角童年時期的書寫, 露西亞的自傳特別偏重於她年少時代所發生的事件, 對於其童年時期只有少許的描寫, 顛覆了傳統自傳小說的形式(Postlewate, 2002: 134)。露西亞身兼女兒、妻子與作家的多重身分, 象徵同年代的許多女性為了妥協傳統教育與後佛朗哥時期新觀念所帶來的變遷而奮戰。不容置疑的, 作者透過自傳小說的書寫空間, 以露西亞的角度重新檢視女性的責任, 試圖解脫父權體系社會的壓迫。

由於孟德羅本身也是西班牙婦運的支持者, 從她作品裡的字裡行間不難窺出女性主義書寫的特徵。若以文化女性主義(cultural feminism)的角度檢視《吃人肉者的女兒》, 女主角露西亞在某些層

4 莎麗·孟德在她著名的專書《被書謀殺》(*Murder by the Book*)曾提到心理分析與偵探小說具有相似之處, 乃在於兩者皆喜好運用倒敘的方式詮釋事件的真相, 儘管如此, 「心理分析與女性偵探小說都較重視探索內部影響而不是外在事件」, 另外, 「偵探小說對於遭受暴力的女性, 提供理想的媒介來抒發其內心的痛苦與憤怒」(1994, 206)。因此, 筆者認為孟德羅運用了偵探小說體裁以探討女性的個人經驗。

面符合文化女性主義的特點。根據阿爾寇福（Alcoff, 1988: 406）的論點，文化女性主義興起於七〇年代的美國，它主要的目標是創造獨立的女性文化，讚揚女性的特質，以超越男性的思維框架。文化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的被壓抑源自父系文化所帶來的性別壓迫，但不強調推翻父權制，而致力於認同女性獨特的氣質，弘揚那些被貶低的女性價值，以建立以女性為中心的文化。文化女性主義者認為，基於生理及社會化過程，男女兩性形成不同的價值觀。我們發現從露西亞的自傳書寫不時流露女性的特質，例如：對家人與朋友的關愛、重直覺、母性思維、具有合作機制、編織親密關係的能力。她雖試圖摒棄父系文化的桎梏，追尋個體的自由，但並未主張排斥男性，也未特意強調男女平等的議題。然而，對於文化女性主義的女性優越論，露西亞並未讚美女性的生理特質，反而質疑女性的生理結構所造成的母性刻板印象。

在前面有關美式硬漢偵探小說的文本相互指涉之分析，我們已提到拉蒙失蹤對於露西亞個人生活的重大影響。實際上，女主角面臨丈夫的離去，顯現女性在父權社會的屈從態度，例如恭順、完全的依賴對方。露西亞坦白的向讀者承認「傳統」如何影響她的生活，即使她對傳統女性的被動、依賴十分憎惡，但隨著時間的消逝，無形中自己已逐漸變成依賴丈夫的寄生蟲。當拉蒙消失時，露西亞有一股強大的責任感驅使她尋找丈夫，「但不是因為他是我的丈夫，而是因為習慣所致」。這樣的責任感應該是傳統女性的共同特徵之一，也證明了她們一般所展現的不是單一的個體，而是附著在他人的附屬品。根據露西亞的告白，她的另項特徵是沉默。她不敢提高聲音，更別說是表達自己的心聲，在公共領域裡堅持自己的辯證。相反的，露西亞習慣於緘默，習慣於附和他人，因而「外表看來沉靜、女性化，內心卻顯得

非常沮喪」(42)。十分有趣的是敘述者在文中曾提及羅莎·孟德羅，且視她為女性自我實現的偶像。這裡我們發現後設小說的特徵，因為小說中的羅莎·孟德羅恰巧與《吃人肉者的女兒》的真實作者——羅莎·孟德羅重疊，兩者都呈現當今女性主義者的強勢形象。關於小說中的羅莎·孟德羅則有頗為誇張的描寫，例如孟德羅是位「獨裁者」、「愛發出尖叫」，帶著黝黑的皮膚，「耀眼、雪白的牙齒配上如黑月亮般的圓型臉蛋」(42)。這些形容詞似乎顛覆了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論述，相對地試圖建構女性主體的論述。

實際上，露西亞對於女性主義之覺醒源自於拉蒙離奇的綁架案。女主角為了實現自我，開始質疑且挑戰傳統父權社會對於女性身分的定位，尤其在婚姻與家庭方面。露西亞帶著幽默與反諷的口吻確信，大多數的女性仍舊認為生兒育女是她們人生神聖的任務，「彷彿生產是人類最傑出的工作」(19)。當小說即將進入尾聲時，真相一切大白，女主角再次討論母性的主題（懷孕、生產），也詳細的向讀者揭露自己的墮胎乃因那場幾乎令人致命的車禍。自然而然地，露西亞失去了女嬰，失去了子宮，變成「空虛」的女人（無法受孕）。敘述者引用了通俗的用語「他們把我掏空了」，不僅是暗指子宮切除術，也批評了不孕女性長期遭受社會不公平的待遇，「彷彿所有的一切源自子宮」(314)。露西亞認為社會上一一直存有一項錯誤的觀念，那便是女人只是生產的工具，建造女性的身分僅限於她們與父系社會的關係，在此情況下便是父親與丈夫。

關於露西亞的女性主體之建構，當她從電視及收音機獲知拉蒙離奇的失蹤之訊息時，女主角強烈的表達希望被視為一個單一的個體，而不是永遠依附在他人的附屬品。露西亞批評西班牙新聞媒體常流於過度簡短及不正確的報導風格，因為她總是被認定是拉蒙的妻

子，「他們甚至刻板地界定我的身分，彷彿我所有的身分是根據吃人肉者的女兒之事實來界定」（Para colmo me definían filialmente como si toda mi identidad estuviera basada en el hecho de ser la Hija del Canibal）（28）。稍後，女主角向讀者敘述她如何將父親視為食人肉者這既傳奇又殘忍的故事，當然也點出小說書名的典故。一切似乎源於一場發生在西班牙內戰時期的意外事件，當時露西亞的父親與其他同伴迷失在遙遠又大雪紛飛的山區裡，最後父親只好吞食死去的同伴之手臂以求生存。不管食人肉者的故事是否為真實，隨著年齡的增長，敘述者發現父親不再符合殘虐的形象，而她自己也不認同是吃人肉者的女兒。面對身分認同的危機，像露西亞這般的女性邁向重新建構女性主體之路，也不斷追尋女性的新空間。

露西亞很清楚地陳述她個人對生命的省思。愛情則是她時常探討的主題之一。女主角由於父母婚姻不睦的童年經驗，使她不相信愛情，總是對男性有所戒心，認為他們只會引導她朝向墮落之途。對於敘述者而言，異性的戀情是非常的危險，好像「一匹特洛依的馬允許境內敵人之勝利」（155）。露西亞與拉蒙的婚姻終究無法逃脫迷失的威脅。儘管如此，隨著案情調查的進展，露西亞與阿德利安互相吸引，兩人隨即陷入熱戀。就兩人的姊弟戀情而言，女主角嚴厲的批判傳統觀念裡只允許年長男子對於年輕女子所造成的吸引力，而她深信以她個人的魅力必然能吸引年輕美少年。現在的露西亞敢於顛覆一般人所界定的社會禁忌，因為我們總是生活在禁忌的國度裡，無法解脫其束縛，再則大家所認知的「正常」不意味著是最尋常的，反倒是充斥著規範與強制的道德意涵（213）。這種偏離規範的態度也算是露西亞邁向自我實現的一大里程。

在小說的最後一章節中，敘述者不僅對她的書寫做了總結，同時

也向讀者陳述她如何撰寫其自傳，乃是結合了真實、虛構與親身經歷的體驗。相較於孟德羅先前的作品，《吃人肉者的女兒》的女主角打破傳統女性依附他人的特性，進而下定決心結束其婚姻，不再扮演溫順妻子的角色，充分顯示露西亞對父權的抵抗。當小說剛開始時，露西亞因失去了丈夫而感到絕望，不斷重複「我感到孤獨，我不喜歡」；然而小說進入尾端時，經過了一連串與拉蒙失蹤的相關事件後，女主角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她以堅定的口吻口述「我感到孤獨，我很喜歡」。這兩個句子清楚地呈現一項意識形態的重大改變，特別是針對女性解放之議題，可說是從原先恭順、屈從的態度轉為更開放、更獨立的立場。另外，經過長期與拉蒙共處後，敘述者重新擁有屬於自己的家，也重新享有自由，這份難得的自由好像「一個殖民國脫離帝國的統制」(Un país colonial se independiza del imperio) (326) 那般可貴。以這樣的譬喻，孟德羅試圖強調女性所面臨的考驗而掙脫父權體制的規範，追尋自己的道路。露西亞與父母也建立了更親密的關係，尤其與她「食人肉者」的父親。女主角感到特別自由，不再想著她無法生育、無法擔任母性天職的遺憾，因為她的父親將實現個人夢想已久的戲劇理想，參與電視連續劇的演出，扮演祖父的角色，雖然是在舞台上，但也夠令人興奮了。因此，從許多層面來看，儘管小說女主角的婚姻畫下了終止符，我們仍可以說《吃人肉者的女兒》擁有完美的結尾。

四、結論

《吃人肉者的女兒》是孟德羅近年來耐人尋味的佳作，也是西班牙文壇備受矚目的作品。作者巧妙地運用偵探類體裁與女性自傳文體

作為女主角追求自我實現的文本。很明顯地，整個由露西亞進行的調查過程，不僅帶領讀者破解一樁神祕的綁架案件，進而認識當代西班牙社會的變遷與生態，並且也是女主角自我覺醒、自我成長的主要原動力。而女性自傳文體則是再現女性的特質及建構女性主體論述的有利媒介。總之，透過兩種文體的混合使用，小說本身呈現了後佛朗哥時期的女性解構父權體制的社會規範，且重新界定女性的角色，而得以享受個人的私有領域。在故事結尾時，露西亞覺得自己飄浮在未知的時空裡，邁向遙遠的旅程，猶記得一位在機場巧遇的老婦人所言「盡可能的享受人生」；儘管遭受背叛、失落，甚至死亡之威脅，露西亞終能認同女性的經驗，開創屬於女性的精神空間。

參考文獻

- Alcoff, L. (1988) Cultural feminism versus post-structuralism: the identity crisis in feminist theory. *Signs* (Spring), 405-436.
- Anderson, L. (2001) *Autobi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 Coma, J. (1980) *La novela negra: Historia de la aplicación del realismo crítico a la novela policiaca norteamericana*. Barcelona: El Viejo Topo.
- Davies, C. (1998) *Spanish women's writing 1849-1996*.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 Grella, G. (1976) The Hard-Boiled detective novel. *Dimensions of detective fiction* (pp. 37-57).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 Klein, K. G.. (1995) *The woma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arcus, L. (1994) *Auto/biographical discourses: theory, criticism, practi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97) *La hija del canibal*. Barcelona: Seix Barral.
- Munt, S. R. (1994) *Murder by the book? Feminism and the crime novel*. London: Routledge.
- Postlewate, M. (2002) The Use of the Detective Story Framework as a [Pre] text For Self- Realization. *La hija del canibal. Letras femeninas*, 28 (1): 131-148.
- Sanz Villanueva, S. (1985) El realismo en la nueva novela española (西班牙新小說中的寫實主義). *Ínsula*, 464-465: 7-8.
- Valles Calatrava, J. R. (1991) *La novela criminal española*.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Detective Fiction? Women's Autobiography?: An Approach to Women's Self-Realization in Rosa Montero's *La hija del caníbal* (1997)

Chung-Ying Yang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ince the end of the Franco dictatorship, the Second Wave has initiated issues of equal rights for men and women, and there was a boom in creative writing among female authors in Spain. Rosa Montero (1951~)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of female writers that came to prominence in the late 1970s and is also considered a beloved writer by critics and readers. Her work contains a taste of good literature which borrows from the voices of characters of present day to study Spain's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La hija del caníbal*, the seventh novel by Rosa Montero, is a realist novel that maintains a thematic feminism like Montero's previous narratives do and incorporates diverse elements of popular culture. Narrated in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person, the entire story originates from a husband's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and kidnapping. Through the use of detective genre and women's autobiography, Montero attempts to show us how the female protagonist, who is also the narrator of the story, searches for self-realization.

The present essay aims to analyze how detective genre and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can be used as a pretext for women's self-realization, and how the writer intends to redefine gender boundaries in order to represent women's identities and reconstruct a female discourse.

Keywords: detective fiction, women's autobiography, women's self-realization, Rosa Montero, *La hija del caníbal*

◎作者簡介

楊瓊瑩，西班牙拿瓦拉（Navarra）大學西班牙文學碩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Columbus 市）西班牙文學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西班牙語專任副教授。專業研究領域為西班牙二十世紀小說、偵探小說、大眾文化及女性文學。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國際大樓 4 樓），歐洲語文學程

電話：(O) 2939-3091 ext. 88113

E-mail：cyyang@nccu.edu.tw